

# 中国南方地域文化

Zhong Guo Nan Fang Di Yu Wen Hua

徐潜 主编 张克 崔博华 副主编

神秘的中华地理与发现

Shen Mi De Zhong Hua Di Li Yu Fa Xian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 中国南方地域文化



徐潜／主编

张克 崔博华／副主编

谷英姿 宁琳／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南方地域文化 / 徐潜主编.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72-1550-0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区域文化—研究—南方地区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8660 号

书 名 中国南方地域文化

---

主 编 徐 潜

副 主 编 张 克 崔博华

责任编辑 崔博华

装帧设计 DAS 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网 址 [www.jlws.com.cn](http://www.jlws.com.cn)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1550-0

定 价 26.00 元

---

# 序 言

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对既有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普及。该书就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普及而策划的。我们想通过这套图书把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展示出来,让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我们今天振兴民族文化,创新当代文明树立自信心和责任感。

其实,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一样,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综合体”,是一种长期积淀的文明结晶。就像手心和手背一样,我们今天想要的和不想要的都交融在一起。我们想通过这套书,把那些文化中的闪光点凸现出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营养。做好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是每一个发展中的民族首先要正视的一个课题,我们希望这套文库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这套以知识点为话题的图书中,我们力争做到图文并茂,介绍全面,语言通俗,雅俗共赏。让它可读、可赏、可藏、可赠。吉林文史出版社做书的准则是“使人崇高,使人聪明”,这也是我们做这套书所遵循的。做得不足之处,也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4年2月

## 目 录



|        |       |
|--------|-------|
| 一、吴越文化 | / 1   |
| 二、岭南文化 | / 35  |
| 三、荆楚文化 | / 64  |
| 四、湘西文化 | / 100 |
| 五、徽州文化 | / 134 |
| 六、百越文化 | / 170 |



吴越文化

。其界位南氏非南氏而南氏一升古國中，其文與國而南氏不升其文與吳  
好春。其一好出好出而南氏文，其升升而南氏不升，其升升而南氏不升  
越，吳越國而南氏不升，其升升而南氏不升，其升升而南氏不升。

## 吴越文化

中华大地历史悠久，其间为世人提供、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吴越文化就是一种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吴越文化区又称江浙文化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日的苏南、皖南和浙江省。吴越文化区内产生的河姆渡原始文化，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充分表明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也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 一、吴越文化的来源和特征

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中国古代一般以淮河为南北方的分界线。淮河以南的长江下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面貌相对比较一致。春秋战国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崛起吴、越二霸，因此我们称这一带为吴越文化区。



### (一) 吴越文化的来源

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有关吴越文化的详细记载是从春秋始，确切讲是从句吴王寿梦（公元前 585 年称王）开始。当时的句吴在寿梦的领导下开始强盛起来，他通过“朝周，适梦，观诸侯礼乐”等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让中原人认识自己的国家。也就是从此时起，吴越两国成了晋楚相斗的国家，也因此开始逐鹿中原。这一地区在公元前 11 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

七千年间，吴越文化经历了几次沧桑巨变。从公元前 333 年楚威王“大败越”到汉武帝时期，经过两百多年的种族大换班，吴越地区由夷越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这是吴越文化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属民族属性的转型。吴越文化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型变为汉代以后的崇文型，政治色彩由浓转淡。从东吴到南宋，吴越地区出现三次发展机遇。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是中华文明的三次劫难，幸亏长江以南土地辽阔，使中华文明有足够的退身之地。这三次劫难，有两次迫使朝廷搬家，即永嘉之乱与靖康之难。朝廷两次搬家，都搬到吴越地区，第一次搬到南京，第二次搬到杭州。三次移民潮带来中原先



进文化，经长期融合，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才呈现纯正、成熟、鼎盛状态。三次移民改变了南北方的经济文化地位。从南宋开始，吴越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地，吴越文化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区域文化。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又经历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是全国性的，不限于吴越地区。吴越地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文化精英聚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枢纽，吴越地区成为文化转型的最先进地区。经过这次转型，吴越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率先与世界接轨，从古代型变为近代型，这是文化时代属性的转型。

## （二）吴越文化特征

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文化的地域特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生产方式，三是人文环境。长江下游温湿多水，河网纵横，使人性柔；长江下游种植水稻，养蚕缫丝，生产方式精致细密，使人心细；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长江下游自古多艺术，南宋以后有“江南人文薮”之称，使人气质文雅。柔、细、雅，似乎可以称得上是七千年吴越文化的个性特征。

七千年前的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哪一个地方的艺术品，能像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那么精致、柔雅、富于想象力？四五千年前的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哪个地方的艺术品像良渚文化玉雕那么精致高雅？春秋晚期，吴越争霸，尚武精神发挥到极致，但是即使在这一非常特殊的时间段里，吴越兵器仍然是全国兵器中最精致的艺术品。当时最美的文字是鸟篆书，鸟篆书以越国最发达。夫差与勾践都有卧薪尝胆精神，卧薪尝胆是以柔克刚。越剧可以看做是吴越文化的样品，其柔、细、雅的文化气质表露得淋漓尽致。以女小生为特色，这就决定了越剧的风格是柔美、细腻、文雅。从剧目、唱腔到服装都充满着柔、细、雅的特点。





## 二、吴越文化的原始文化

### (一)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处重要聚落遗址。它是 1973 年夏天当地农民兴修水利时发现的，总面积约 4 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第四文化层距今约七千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六千五百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五千六百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五千年。1973 年和 1977 年冬季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 2630 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六千七百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畜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等遗存。丰富的出土文物充分展现了我国南方氏族社会历史时期的繁荣景象，为研究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所以命名为河姆渡文化。像河姆渡遗址这样历史悠久、文物埋藏全面又丰富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的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四十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的。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十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他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 20—50 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 80 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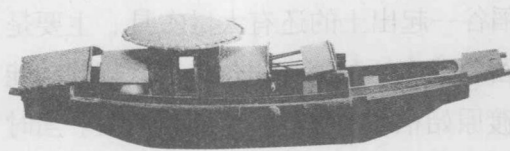


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两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梗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我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一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

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是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较高的建筑技术彰显了河姆渡人的智慧。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三百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为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





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

针，有九十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0.2厘米，针孔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是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二十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鸚鸟相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 (二) 马家浜文化

马家浜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始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及其后续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表明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自成系统，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1957年发掘的浙江吴兴邱城遗址，下层是以红陶为主的遗存。1959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在嘉兴马家浜遗址发掘，发现有与邱城下层同类的



遗物并有房基、墓葬等遗迹。同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发掘的吴江梅堰遗址中，也含有这一类遗存。20世纪60年代，有人把它归属青莲岗文化。后来，有人进一步定为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的马家浜期。20世纪70年代起，有人把它与青莲岗文化相区分，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现已普遍得到承认。经发掘的主要遗址，除马家浜、邱城外，还有浙江桐乡罗家角、江苏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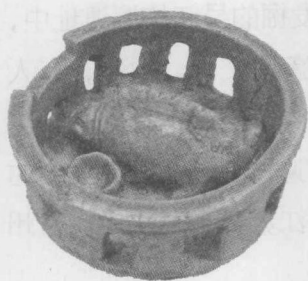
马家浜文化主要特点有三：其一，盛行俯身葬。有些死者头骨用陶器覆盖，或是把头骨另放在陶器内，这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葬俗。其二，陶器主要是红陶，以外红里黑或表红胎黑的泥质陶为特色，多素面，外表常有红色陶衣，器形以宽檐釜（或称腰沿釜）、牛鼻形器耳的罐、圆锥足鼎等具有代表性。其三，使用玉璜、玉珏等装饰品，这类玉器后来成了中国的传统饰物。

根据圩墩遗址的地层堆积，结合罗家角、马家浜、草鞋山等遗址的地层关系和陶器演变的排比资料，目前可将马家浜文化分为三期。早期：为马家浜下层和罗家角第四层。陶器以灰黑陶和灰红陶为主，绳纹较多见，器形以釜为主。中期：为马家浜上层，罗家角第一、二、三层，圩墩下层和草鞋山第十层。陶器以夹砂（包括夹蚌）红褐陶为主，仍有一定数量的灰黑陶和灰红陶，以素面的为多，绳纹基本消失，器形仍以釜为主，出现少量的鼎和较多的豆，还有牛鼻形耳的罐。晚期：为圩墩中层和草鞋山第八、九层。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衣陶为主，主要器形是釜、鼎、豆。

农业生产是马家浜文化居民定居生活的基础。在圩墩发现一件残木铲，仅存铲身，两面削成扁平状，刃部较薄，应是掘土工具。收获用的石刀数量较少，而且制作也较粗糙。作物主要是水稻，在罗家角、草鞋山和崧泽遗址下层都发现稻谷，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罗家角第三、四层出土的粳稻，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粳稻遗存。同时，在罗家角遗址还发现有籼稻。从粳、籼稻粒的数量比例分析，当时籼稻的种植比粳稻要发达。同时，还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畜。

渔猎经济也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发现的骨镞，以柳叶形的居多。在马家浜、崧泽、圩墩等遗址的下层，都有大量的兽骨





堆积。如马家浜有的兽骨堆积厚达二三十厘米。圩墩的野生动物骨头经过鉴定，有梅花鹿、四不像、野猪、獐、貉和鸟类、草龟、鼋、鲫鱼等。其中，梅花鹿、四不像和野猪的数量较多。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野生的桃、杏梅的果核和菱角等，这些是人们从事采集活动的例证。

石器的磨制技术较高，器类以锛为主，体型较厚，有孔石斧大都呈舌形，体也较厚。这种磨制精致的锛、斧，主要应是加工木器的工具。在圩墩遗址发现有铲等木器。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均为手制。一般陶色不甚纯正。器表以素面的为多，纹饰有堆纹、弦纹、镂孔、圆窝纹、刻点纹、绳纹、篮纹等。主要器形有釜、鼎、豆、罐、瓮、盆、钵等。还出土有陶质炉、箕、三足壶形器等其他文化所未见的器物。大都火候不高，陶质较软，制陶技术还处于较低的阶段。在草鞋山遗址发现了公元前 4000 多年的三块残布片，经鉴定，原料可能是野生葛。系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密度是每平方厘米经线约 10 根，纬线罗纹部约 26—28 根，底部 13—14 根。花纹有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属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这是中国目前最早的纺织品实物。

在草鞋山遗址，发现由 10 个柱洞围成的近圆形的房基残迹，面积约 6 平方米。在马家浜遗址发现的是长方形房基，面积约 20 平方米，其东、西两侧各保存柱洞 5 个，南面一侧有柱洞 3 个。上述两地房屋的柱洞中，有的还残存木柱或在洞底垫有朽木板。这种木板与柱础的作用相似。圩墩遗址出土有榫卯结构的木柱。在邱城遗址发现的居住面用砂土、小砾石、陶片、贝壳和骨渣等混合筑成，还在居住区内挖小型沟道，附近有石筑的长条形公共烧火沟。

在马家浜、圩墩、草鞋山等地共发现墓葬二百多座。多为单人俯身葬，也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和侧身葬等，多数头向北。在草鞋山和圩墩墓地，还发现有几座同性合葬墓，同一墓内的死者年龄相近。在草鞋山有些死者头骨用釜、钵、盆、豆等陶器覆盖，有的把头骨另放在陶器内。随葬器物一般都很少，主要是日用陶器。草鞋山的 106 座墓中，有 25 座无随葬品，其他的有 1—4 件，最多的为一座成年女性墓，有 9 件。随葬品大都是 1 件食器，或食器和炊器各 1 件。食器以豆为多，其次为钵，也有罐、盆、杯等，炊器以釜为多，或用鼎



代釜。用生产工具随葬的只有2座墓，各放1件石斧。有的墓还随葬玉环、玉镯等装饰品以及鹿角、兽牙、蚌壳等。一般认为，马家浜文化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上述同性合葬墓的出现，大体是这个阶段在葬俗上的一种反映。

有人认为，马家浜文化由河姆渡文化发展而来。持此意见者把河姆渡遗址第三、四层定为河姆渡文化，将其第二层归属马家浜文化，并认为在地层叠压和器物演变上，这两种文化是先后承袭发展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均属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则另有来源，需再作探索。持此意见者指出，马家浜文化的中、晚期，与河姆渡遗址第二层的年代大体相当，而分属于两个考古学文化，存在相互影响交流的关系。例如，河姆渡遗址第二层的泥质外红里黑陶、牛鼻形耳的罐等，与马家浜文化的有相似之处，是河姆渡文化晚期受马家浜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一件作为马家浜文化代表性陶器的残宽檐釜，明显是在马家浜文化影响下产生的。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与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相比较，器物的差别是主要的，但也有部分近似的器物，例如扁平穿孔石锄、有孔石斧、扁足釜形鼎、敛口矮圈足豆、单耳罐和带流圈足罐等，这说明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曾在江苏北部淮安青莲岗遗址发现有个别的宽檐釜，当是在马家浜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至于马家浜文化的去向，在草鞋山遗址第七层发现六座墓葬，头向、葬式与叠压在其下的第八、九层马家浜文化墓葬相似，而陶器的陶质和大部分器形，又具有崧泽文化的特点，因此，有人建议把这层作为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过渡的例证。通过普遍发现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的上下层叠压关系，以及从整体上分析这两种文化遗存的内涵，可以确定从马家浜文化演变发展成为崧泽文化。

### (三)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四五千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





心的五十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良渚文化包括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江苏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寺墩，常熟罗墩和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安徽阜宁等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这一时期的文化。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期玉文化的两大中心。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

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

良渚文化时期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象和神人兽合一的形象，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良渚文化玉器创造性的器型，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画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被发现的陶纹，透露了当时社会文明进步的信息。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畝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



“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 47 根，丝带为 30 根单纱分 3 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苧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 24 根，有的细麻布经线 31 根、纬线 20 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苧麻织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二百多件。竹箴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箴，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簋、篮、谷箩、簸箕、箕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的 3 座，其中一座东西长约 2.5 米，南北宽约 1.9 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の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 4—5 块长约 2 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从草鞋山、张陵山等地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演变而来的。崧泽文化的墓葬，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崧泽文化的石镞，背面逐渐出现脊线，正处于良渚文化阶形有段石镞的前一阶段。两者的穿孔石斧也相似。崧泽文化的扁方侧足鼎、细高把豆、高领扁腹壶等，与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细高把豆、高领贯耳壶等有着继承关系。另外，距今五千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大量的玉器体现了“玉器文明”时代，人们把玉器饰





品功能转向具有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出玉礼器的作用和地位，一些玉器的形制和墓葬中大量陪葬玉器的方式同良渚文化也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关系。关于良渚文化的发展去向，马桥中层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马桥中层叠压在马桥下层即良渚文化晚期遗存之上，发现的石镰、有段石铤、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与良渚文化接近，

而后两种石器的数量比良渚文化时期又有所增加。马桥中层的黑衣陶与良渚文化的黑衣陶存在承袭关系，两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关系。至于马桥中层含有较多数量的印纹陶，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与良渚文化存在联系，其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铤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在上海县马桥、金山县亭林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数片涡纹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马桥、雀幕桥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也当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关。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陶器都普遍采用轮制，黑陶占有显著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面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表现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 (四) 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因为这类遗存最早发现于上海马桥遗址中层而命名。从年代上来讲，马桥文化紧接着良渚文化，但文化面貌上截然不同。马桥文化继承了少量良渚文化的文化因素，而且整类良渚文化因素在马桥文化中不占主导地位。研究成果表明，马桥文化来源于浙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同时它还包含了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对照中原地区的王朝序列，马桥文化的年代大致与中原的夏和商相当。

马桥文化的遗存在杭嘉湖地区都有分布，由于一些客观上的原因，对浙江境内的马桥文化研究不够深入。平湖地区以往曾有一些马桥文化的遗物出土，但缺乏原生的地层堆积。在后来发掘图泽遗址的过程中，除了发现了崧泽文化